

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构建路径与中国镜鉴

徐启程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 100044

DOI: 10.61369/VDE.2026070036

摘 要 : 国家认同教育是使国民具有国家归属意识和公共责任感的重要方式。新加坡有独特的殖民历史和移民社会结构, 特别是在全球化冲击下, 经过数十年发展形成了以制度为框架、以文化为根基, 以自觉培育为动力的国家认同教育路径。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教育经验从制度保障、文化融合与教育创新三方面为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重要镜鉴。

关 键 词 : 新加坡; 国家认同教育; 中国镜鉴

Construction Path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Xu Qicheng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foster citizens' sense of national belonging and public responsibility. With a unique colonial history and immigrant social structure, Singapore has developed a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path over decades amid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th takes institutions as the framework,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and conscious culti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Singapore's experience i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offers valuabl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o carry out relevant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Keywords : Singapore;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to China

引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关系到国家的团结和长治久安。新加坡在独立后通过有效的国家认同教育, 迅速发展成为了国民认同度高和社会凝聚力强的现代化国家。中国与新加坡尽管国情差异较大, 但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处在民族复兴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一、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构建的现实背景

(一) 殖民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与社会分化

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教育必须要面对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1824年, 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 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民族隔离政策, 形成了人为的空间隔离。这种空间隔离阻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流, 导致各民族被迫处于长期无法融合的状态, 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意识。1942年, 新加坡又被日本占领进入到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在英国殖民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分化政策, 在承认马来贵族的传统特权的同时将华人视为敌对方并残酷镇压, 这种政策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 使原本就脆弱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和紧张。在英国与日本相继的殖民统治下, 新加坡各族群内部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 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意识。在这一背景下, 新加坡

在1965年独立后将强化国家认同视为国家生存发展的重中之重, 注重通过教育和语言等多方面的手段塑造具有包容性与凝聚力的“新加坡人”身份。

(二) 移民社会特有的认同困境与融合难题

新加坡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其民族结构多样。20世纪后期, 新加坡的人口结构主要由华人、印度人以及马来西亚人构成。这种多元民族构成, 既使新加坡有独特的创造活力, 也为其国家认同带来了很大挑战。一方面, 早期移民普遍抱有“侨居”心态。自19世纪新加坡成为自由港以来, 大量移民来此谋生。这些移民多以经济改善为目的, 视新加坡为暂居之地, 情感上仍深深扎根于遥远故土。^[1] 国家认同指向故土而非新加坡。另一方面, 多元民族结构导致族群间互相排斥。各族群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子, 民族意识要强于国家意识。特别是在地缘政治上, 新加坡作为以华人为主的国家, 处于马来人占多数的东南亚文化圈中,

进一步加剧了新加坡国内族群关系的敏感性。因此，新加坡独立后面临的要在族群多元的基础上，构建起超越种族差异的统一国家认同。

（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价值重构

新加坡独立后利用其地理优势迅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实现了经济腾飞。作为全球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构建面临着内部文化多元和外部文化冲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多民族共存的格局造就了多文化共存，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分属不同的文明体系，语言、宗教与生活习俗的差异造成价值观念难以融合。^[3] 语言上虽在行政上借助英语实现沟通，但各自族群依然有自我语言。宗教上多元信仰并存，因教义和实践差异形成理解障碍。这种文化基础的异质性使得处理文化多元与统一之间的关系成为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新加坡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国内外文化的频繁碰撞，使得国家认同在文化交融中面临被稀释的危机，实现文化开放与身份坚守的平衡，成为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另一重要问题。

二、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构建路径

（一）以制度先导构建国家认同的外部框架

在建国初期，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与薄弱的社会共识，新加坡政府选择了以强有力的制度认同作为培育国民国家认同的起点和保障。新加坡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将国家认同教育高度体系化。在机构设置上，新加坡于1988年成立了国家意识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性的国家认同教育活动。在政策层面，新加坡政府先后发布了多项与国家认同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包括1991年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1997年推出的“国家教育计划”、2010年发布的“21世纪技能框架”。此外，法律规范也为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强制力保障。如，1990年颁布《维持宗教和谐法案》，防止宗教冲突对社会和谐与国家认同造成破坏。同时，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还将宏观制度框架细化为社会政策，包括实施组屋计划、语言政策、节日安排、宗教政策、社会群众组织管理、基层管理等有利于共同体构建的各种基层政策措施^[3]，为新加坡国民提供了公平感，从而在理性层面建立了对国家的基本认同，为国家认同教育搭建了以制度为先导的外部框架。

（二）以文化浸润夯实国家认同的内在根基

随着新加坡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和社会结构逐渐变的稳定，单纯依靠利益推动的制度认同慢慢暴露出弱点，因此新加坡政府适时将国家认同教育的重心由制度认同向文化认同转变。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场价值重塑运动，1991年新加坡政府正式发布将传统东方价值观与现代国民意识相结合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为国家认同教育的教育内容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由于国家发展的历史短暂，新加坡政府还有意识地通过国家发展故事传播国家历史。新加坡学校形成以“新加坡故事”为主线讲述国家从殖民统治到独立繁荣历程的历史教育方式，以这种形式激发国民的忧患意识和自豪感，强化国民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新

加坡政府通过这些持续不断的文化浸润，将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从制度服从变为内在的情感共鸣，为“新加坡人”这一身份增添了丰富的情感。事实证明，新加坡政府这种全方位的文化浸润有效加强了国家认同教育的效果，在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成功塑造了统一的新加坡人身份。

（三）以自觉培育激发国家认同的持久动能

随着国家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无论是制度规范还是文化浸润如果不能转化为国民的自觉认同，那么国家认同便难以持久维系。因此国家认同教育的更高目标是能够让国民自觉培育国家认同意识，也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激发国民主动维护国家的内在动力。学校是促进国民国家认同意识自觉培育的主要方式。新加坡注重将国家认同教育融入各学科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当中，这种“做中学”的方式能够促进学生知情意统一。社区与基层组织也在促进国民国家认同意识自觉培育中发挥重要作用。^[4] 新加坡通过遍布全国的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国民咨询委员会等基层组织，让国民通过参与贴近日常生活的社区事务在互动中将国家认同转化为具体的邻里关怀。此外，媒体与公共传播也服务于自觉培育国民国家认同的目标之中。主流媒体通过共同价值观宣传和一定程度的理性探讨让国民在参与社会议题讨论中增强主人翁意识。

三、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的中国镜鉴

（一）完善制度保障，筑牢国家认同根基

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能够形成良好的成效，与新加坡不断完善法制政策和社会治理密不可分。这一经验启示我们，必须要将国家认同教育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我国应该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国家认同教育的核心目标，应制定专门针对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的长期发展规划使政策更加完善，同时要积极推动相关立法进程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为我国国家认同教育实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也应不断完善，学校应该发挥主渠道作用，将国家认同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家庭也应通过言传身教从小奠定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情感，社会也应该提供丰富的实践场所和文化活动，只有建立起家校社协同配合的完善制度体系，才能保证国家认同教育的系统性和长期有效性，最终服务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深化文化融合，培育国民情感认同

新加坡在充分尊重国内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成功让国民形成超越种族和宗教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这一成功实践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的国家认同教育，必须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每一位国民在内心深处都有稳固的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语言统一是国家认同构建的重要环节。^[5] 必须在尊重各民族语言的基础上推广普通话，只有语言一致才能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成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想交流和情感融合。同时历史教育在国民认同中也扮演者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必须要形成以中华民族发展

史为主线的叙事，强化全民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不过也要注意在开放包容的同时要保持文化自信与定力，积极抵御外部不良文化的侵蚀。

（三）创新教育方式，提升国民认同自觉

国家认同教育应注重“知情相符”，即认知教育与情感培养相结合。^[6]新加坡通过社区服务、野外训练等体验式教育，使学生将国家认同内化为行为习惯，体现了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内化的教育路径。我国的国家认同教育需实现从知识传授到价值塑造与行为养成的进一步提升。在内容上，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有机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及其他各学科课程，使教育内容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情感温度。在方法上，要大力推行实践教育、情境教育和启发式教育。广泛利用博物馆、纪念馆、资源，组织研学实践活动，设计富有仪式感的教育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国家发展与个人责任的关系。在载体上，要善于运用新媒体、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创作文化产品，使国家

认同教育无处不在、润物无声。最终目标是激发每个国民，尤其是青少年，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对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归属感、自豪感与责任感。

四、结语

新加坡从现实问题出发，以制度构建提供框架与保障，以文化整合培育情感与共识，以自觉内化激发动力与持久性，为多民族国家如何构建统一、稳固的国民认同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范例，为中国国家认同教育的构建提供镜鉴。我国应完善国家认同教育的顶层设计，积极创造各民族交往交融的社会环境，在尊重多样性的同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环境，最终达到更好地凝聚国民共识，筑牢国家认同的目的，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黄小龙，杨静林. 新加坡民族政策的变迁与族群意识的演化 [J]. 世界民族，2024，(01):99-113.
[2] 王浦劬，徐逸杰. 新加坡国家治理“基层”单元辨析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64(04):48-56.
[3] 宋婉贞. 塑造国际规范：小国视阈下新加坡在全球治理“新疆域”中的角色 [J]. 太平洋学报，2025，33(05):14-30.
[4] 张利国，郭立强. 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J]. 理论导刊，2017，(03):108-112.
[5] 滕珺，白瑞涵，徐紫霄. 社会情感学习的再认识——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发达国家比较研究 [J]. 复旦教育论坛，2025，23(02):5-13.
[6] 孙银光. 国家认同教育的历史演进、理论发展和实践发生逻辑 [J]. 中国远程教育，2023，43(12):86-94.